

# 生态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陈仁锋, 庞 虎

(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生态马克思主义旨在寻求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这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主题基本一致。生态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发, 主要有: (1) 以民众的生态思想解放作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观念先导; (2) 从人与人的矛盾视角来探讨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 进而把握生态文明建设的特质; (3) 强调制度的决定作用, 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制度优势。

[关键词] 生态马克思主义; 生态文明建设; 启示

[中图分类号] B 0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89X (2019) 04-0009-06

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sup>[1]50</sup>, 旗帜鲜明地强调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必须牢牢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主题。生态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学派之一, 直面当前人类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 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生态意义的解读, 试图探索一条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现实路径, 这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主旨基本一致。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能为我国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 一、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理论争鸣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sup>[1]50</sup>可见, 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主旨下, 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以人民群众的需要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然而, 面对当前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 西方风起云涌的绿色思潮中存在这样的两种声音: 一种声音是“生态中心论”, 认为生态危机根源于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对自然的

工具性态度和过度剥削。他们以“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为基础, 片面强调“地球优先性”, 从反对人的欲求出发, 进而反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运用, 将人类文明和生态文明对立起来; 另一种声音是“现代人类中心论”, 反对激进的自然主义, 主张在资本主义的制度框架下, 通过改造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 以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来组织生态运动和建设生态文明, 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理论。<sup>[2]</sup>

应该看到, 上述两种声音与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主旨背道而驰。“生态中心论”过分突出了自然的优先性, 忽略了生态文明建设是为了促进人类文明的更进一步发展; “现代人类中心论”虽然声称以人的利益为出发点, 但其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从事环保行动的做法, 实则回避了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制度基础问题。由资本逐利性所决定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反生态性, 使得资本主义发展与生态文明进步从一开始就是相悖的, 从而必然导致他们所谓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实际上反映为资本的利益, 他们所提倡的可持续发展本质上不过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和巩固。生态马克思主义正是在批判这两种观点的基础上不断发展起来的, 并从中阐发了两个具有创见性的观点: (1) 把人与自然间的矛盾进一步追溯为人与人间的矛盾, 进而在

[收稿日期] 2019-01-14

[作者简介] 陈仁锋 (1994—), 男, 福建德化人, 硕士生,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庞 虎 (1978—), 男, 山东茌平人, 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处理人与自然间的关系时,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调整视为解决问题的根本环节;(2)规定着人与人关系的社会制度不仅对人类社会同自然界物质与能量间的交换有着决定性影响,同样也在价值观上影响着人对于自然的看法和态度。由此,生态马克思主义把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扭曲归结为生态问题的根源。与此相应,在解决生态危机的问题上,他们诉诸资本主义制度的变革和人的思想解放。

在上述生态思潮的论争中,来自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启发可概括为以下三方面内容:(1)“人的生态意识是最大的生态资源”<sup>[3]</sup>,培育民众生态意识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观念先导;(2)以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去理解人与自然的矛盾,进而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调整来把握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要义;(3)领会生态马克思主义为实现制度变革而提出的生态社会主义构想,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 二、观念革新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先导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sup>[4][524]</sup>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语境下,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形式必然产生与之相适应的人的思想意识。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视域下,生态问题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反生态性”,那么与之相适应的人的思想意识必受影响而产生一定的偏差。他们虽然反对“生态中心论”和“现代人类中心论”,单纯从人的价值观的改变来解决生态问题的观点,但是他们同样认为人的价值观建设和思想建设是进行生态文明建设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维度。因为生态问题本质上反映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人的关系问题,那么不仅需要为形成更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实现制度变革,同时更要挖掘和铲除资本主义下造成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基。对此,他们呼吁生态问题要进行思想文化审视,既要揭露出导致生态问题的思想文化之根,更需要创建适应于“生态理性”的价值观念基础。他们的

突出贡献可以归结为以下两方面的内容。

1.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从人的需要出发赋予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新的内涵。在“现代人类中心论”中,人的需要本质上反映的是资本的需要,是一种追求物欲、金钱至上的需要。而生态马克思主义提倡的价值观,核心在于以集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本,目的是为了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阿格尔指出,当前的资本主义危机“已经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sup>[5]486</sup>,而生态危机则导源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异化消费”观。在他看来,当前人们的消费不再是马克思所认为的维持其生命和生活的需要,而是“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异化消费现象。<sup>[5]494</sup>正是这种扭曲的需要所导致的对商品的无止境追求和社会的整体物欲化,维持了资本的不断积累和生产再扩大,由此引发有限的生态资源和无止尽的资本生产间的矛盾。对此,阿尔格提倡消灭异化消费,实现人的需求革命。福斯特也指出,生态问题与人们不道德的观念和行为相关,并且他还深刻地认识到这种错误的伦理道德观同资本的生产关系密切相连。这种与资本相适应的金钱至上观和将个人利益凌驾于集体利益之上的伦理道德观必然会引导着人们对生态环境进行肆无忌惮的破坏。对此,他要求人们从思想观念入手解决生态问题。<sup>[6]</sup>

2. 建立与生态理性相适应的技术伦理。在对待技术与自然的关系这个问题上,“生态中心论”者直接抹杀了技术进步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作用,而“现代人类中心论”者则把技术的运用建立在经济理性的基础之上。相较之下,生态马克思主义试图建立的是一种与生态理性相适应的技术伦理,从而改变以往人们把技术视为控制自然和满足人类欲求的工具性态度,使技术进步服务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针对这个问题,莱斯指出了认识生态危机的根源及摆脱途径上的“两个陷阱”:(1)他批评了资产阶级把环境保护等同于经济代价的态度。他指出,在资本主义体制中,无论是官方政府还是私人企业总是“把环境质量问题的归属于无所不包的经济核算问题”<sup>[7]3</sup>,这就使得追随这种论调的人们把“环境质量”仅仅视作“一种可欲求的商品,在价格

合适的时候就可以购得”“结果是完全把自然的一切置于为了满足人的需要的纯粹对象的地位”。<sup>[7]2</sup> (2) 针对一些思想家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咎为科学技术的看法,他指出,这些思想家的错误在于抛开了技术运用的历史背景,实际上由于“每一个历史时期人都与自然进行斗争以维持自己的生存”,人类历史中的一个“恒常现象”就是“为使环境服从人的目的而发展出来的各种技术”。<sup>[7]95</sup> 因此,科学技术不过是人们为达到控制自然的目的而采取的工具,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控制自然的观念才是引发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在他看来,人类必须改变这种根深蒂固的统治自然的观念,从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出发来约束自己的生活和发展。

在2018年5月18日的全国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已进入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攻坚期,也到了有条件有能力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的窗口期。”<sup>[8]</sup>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数十年发展,我国当前已然具备应对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的物质条件,但是民众的生态意识仍有欠缺,如阿格尔所言的异化消费在我国当前的社会中是普遍存在的。那么,生态马克思主义对于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就在于:重视生态建设实践中实践主体的培养,着力实现民众的思想变革,即通过提高全民族的生态道德素质,使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实践主体具有自觉的生态意识、坚定的环保理念以及对自然的责任感,促使他们在环保实践中自觉自主地实现绿色生产、绿色消费以及绿色生活。因此当务之急就是通过唤醒民众的环保意识,实现民众的生态思想解放,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先行奠定坚实的思想道德基础。

### 三、人与人关系调整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核心要义

如何理解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进而把握当代生态文明的特质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认识前提。认识这个问题所采取的高度和角度也就决定了在实践中解决生态问题的策略和行动。在这个问题上,西方绿色思潮的理论家们普遍认

为,生态危机源自人与自然相处的方式与理念出现了偏差,他们把生态文明的特质局限于人的价值观变革。<sup>[2]</sup>

1. 就“生态中心论”而言,他们认为,生态危机的本质是人类价值观的危机,是长期以来人类把自身凌驾于自然之上,并把自然仅仅视作服从人类需要和利益的工具这种主观价值论,才最终导致了人与自然间日益深重的矛盾冲突。在理论上,他们一方面主张自然具有不依赖于人的内在价值和生存权利,片面强调自然对于人的优先性;另一方面,他们把生态危机归咎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运用,把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同生态保护对立起来。这种对生态问题的理解,在实践上必然导致反人道主义、反对经济增长和技术运用的激进环境保护运动,这种运动通常由无政府组织以经济破坏等方式来宣泄对环境问题的不满,是历史的倒退。正如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斯·奥康纳所说,“生态中心论”者解决生态危机的实质不过是一种浪漫主义遐想,为的是使自然回归到“未被污染的、未被人类之手接触过”的“荒野”状态。<sup>[9]35</sup>

2. 就“现代人类中心论”来说,他们一方面反对“生态中心论”把生态危机归咎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做法,进而指出生态文明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发展。在他们看来,只有以人的需要为中心,生态建设才具有可操作、可实践的意义;另一方面,他们又对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缺陷进行了反思,认为这种价值观没有正确区分人的“感性欲望”和“理性欲望”,对自然资源进行过度索取,才最终引发生态危机。因此,这些持“现代人类中心论”的理论家们希望通过以人类利益为本的可持续发展观来改造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虽然他们在生态文明特质的把握上强调了人的需要和人的利益,但是他们的可持续发展观并没有超越资本主义的制度框架,本质上仍然同“生态中心论”者一样,将生态问题的解决诉诸人的价值观的改变。资本主义固有的贪婪本性,必然使他们所谓的“人的整体利益”和“人的长远利益”被替换为资本利益,这主要体现在: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化阶段对生态问题采取的“先污染,后治理”态度,在实现工业化

后又通过自然资源的市场化和商品化等方式转嫁环境污染成本。除此以外,他们还在全球范围内利用空间生产和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对发展中国家进行资源掠夺和生态危机转嫁,并以人类共同利益为借口否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和环境权。<sup>[2]</sup>不难发现,以此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已打上了资本主义的制度烙印。

3. “生态中心论”过分强调自然而贬低人的主体地位,使他们在理论上把自然神秘化,在实践上把生态建设理想化,把环保行动激进化。而“现代人类中心论”在本质上不过是为了维持资本增值而展开的环境保护,绝非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明建设。相较之下,生态马克思主义突破了传统研究拘泥于人与自然对立、人的价值观转变的特点,指出正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人关系的扭曲最终导致了生态危机。例如,法国左翼知识分子高兹就把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源直指资本主义制度。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只“对获取利润感到兴趣”,它“首要关注的并不是如何通过实现生产与自然相平衡、生产与人的生活相协调……它所关注的主要是花最少量的成本而生产出最大限度的交换价值”。因此,在这种生产逻辑的促使下,资本家必然以“最大的限度去控制自然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加投资”<sup>[10]15</sup>,而对由此付出的环境代价置若罔闻;另一位理论家戴维·佩珀认为,生态问题的解决不应简单化为单一的价值观转变,深入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才是解决生态危机的突破口,因为该对生态问题负责的“不仅仅是个性‘贪婪’的垄断者或消费者,而且是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处在生产力金字塔之上的构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sup>[11]133</sup>生态马克思主义能够把握生态文明的特质,与他们立足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紧密相连。马克思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sup>[4]516</sup>可见,马克思在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时突出强调了人的主体地位。在马克思的视域下,自然是“人化自然”,是被作为主体的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改造过的自然。因此,对自然的把握就要“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

理解”,“从主体方面去理解”。<sup>[4]499</sup>可见,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来认识生态问题,其高明之处就是从人与人关系的矛盾层面去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矛盾。

对此,习近平明确指出:“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决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sup>[12]</sup>生态马克思主义对于我们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启示就在于:生态危机并不仅仅是人与自然的对立、经济发展与自然保护的对立,其本质反映的是人与人在环境问题上的利益关系危机。这是我国在建设生态文明过程中必须明了的根本性认识。

#### 四、社会主义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制度优势

生态马克思主义透过人与自然间的对立揭示出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进而把资本主义制度追溯为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与此相对应的是,在解决生态危机的问题上,生态马克思主义将制度变革作为解决问题的根本。他们强调,根治生态环境问题的最佳选择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进而彻底铲除与之伴生的趋利性和不公正。另外,就生态文明应该建立在何种社会基础上而言,生态马克思主义也反对“生态中心论”者所推崇的回到“荒野”的浪漫主义遐想。他们通过着力论证生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向人们展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实现生态与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马克思曾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sup>[4]724</sup>可见,生态危机的产生虽然与人类对待自然的方式和理念相关,但是生态危机的本质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界间的物质能量交换关系的扭曲。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类社会与自然间的物质变换及过程总受制于特定生产关系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因此,当代的生态问题在根本上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制度有着紧密的联系。

基于此,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把攻击的炮火对准了资本主义制度。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生态解读,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主要从三个方面揭露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性”:(1)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从根本上服从于资本追求利润的需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追求超额利润。<sup>[13]193</sup>因此,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这一无止境的逐利目的驱使下,资本主义必然会加剧对自然的掠夺和利用,而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所采取的生态保护措施,也不过是为了满足资本扩大生产所必须的环境条件,其不断扩大生产的本性必然与有限的自然界发生矛盾冲突。(2)在资本主义追逐利益的生产关系上,必然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物欲至上和经济理性的价值观。马克思曾指出:“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sup>[14]90-91</sup>在这种价值观的引导下,人们很容易对自然采取工具性的态度,这样只会加重人们为满足私欲,将环境问题抛诸脑后,进一步造成对自然的破坏。(3)资本在世界范围的扩张必然加重全球范围的生态危机。正如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指出的,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逐渐成为发达国家的原料供应地,甚至沦为洋垃圾、工业废料、夕阳工业的转嫁地。<sup>[2]</sup>

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时,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也以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为基础,构想并阐释了生态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生态社会主义制度强调的是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克沃尔指出,资本之所以造成生态危机,是由资本主义下的劳动力商品化所致。劳动者与生产、生活资料相分离,是商品的交换价值得以实现的基础。而生态社会主义将克服这种分离,进而将使用价值从交换价值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因此以使用价值为中心的生态社会主义将不再具有资本的逐利性质,将在人类和地球生态系统之间建立起全新的财产关系。<sup>[15]</sup>(2)生态社会主义制度将以生态理性取代经济理性。高兹认

为,社会主义具备产生生态理性的社会土壤,而生态理性将用一种“最好的方式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sup>[16]32</sup>因此,社会主义是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变革。戴维·佩珀也认为,生态社会主义的生产将遵循有限度、有计划的“生态理性”,因为“生态社会主义的增长必须是一个理性的、为了每个人的平等利益的有计划发展”,并且“它建立在对每个人的物质需要的自然限制这一准则上”<sup>[11]336</sup>。(3)生态社会主义制度将实现真正的人的需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福斯特提出了“沿着社会主义方向改造社会生产关系”<sup>[17]96</sup>的社会理想,指出,社会主义“不是建立在以人类和自然为代价的积累财富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公正与可持续的基础上”<sup>[17]129</sup>,是满足人们真正需要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的。伯克特则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构想出发,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所具有的生态意义远远超出以往公认的评价”。<sup>[18]14</sup>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虽然建立在资本主义创造的物质财富上,但是,其中的公有制,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消费方式等内容,与可持续的生态发展观念具有一致性。正如马克思自己指出的:“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sup>[4]185</sup>

生态马克思主义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视为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出路,这是因为他们看到了生态文明只能存在于生态社会主义制度之中。在这里,生产的目的不再是交换价值,生产方式也将遵循生态理性。由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不再建立在利益竞争的基础上,社会的生产方式也将以真正的人的需要进行重构。生态社会主义并非使人类退回到工业化前的自然状态,相反,它将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生产力所创造出的物质财富和科学技术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创造物质条件,同时,它也将克服工业文明中的经济理性,建立起一种实现人与自然界物质能量交换良性循环的、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当前,我国已然进入了以生态文明为导向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制度优势。对此,一方面当充分发挥出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从解决人与人的紧张关系入手,坚持贯

彻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观,将发展生产力与环境保护充分结合起来,以此“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sup>[1]50</sup>;另一方面,警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掠夺和生态危机转嫁问题,在切实维护我国的发展权和环境权的同时,“推动和引导建立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彰显我国负责任大国形象,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sup>[6]</sup>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十九大报告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 [2] 王雨辰. 当代生态文明理论的三个争论及其价值 [J]. 哲学动态, 2012 (8): 24-30.
- [3] 陈学明. “生态马克思主义”对于我们建设生态文明的启示 [J]. 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8 (4): 8-17.
- [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5] 阿尔格. 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 [M]. 慎文,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
- [6] 陈学明. 论福斯特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给予我们的启示 [J]. 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32 (6): 27-36.
- [7] 威廉·莱斯. 自然的控制 [M]. 岳长龄, 译. 重

庆: 重庆出版社, 2007.

- [8] 习近平. 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 [EB/OL]. (2018-05-19) [2018-11-20].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8-05/19/c\\_1122857595.htm](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8-05/19/c_1122857595.htm).
- [9] 詹姆斯·奥康纳. 自然的理由 [M]. 臧佩洪, 庚正东,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 [10] ANDRE GORZ. Ecology as politics [M]. Boston: South Press, 1980.
- [11] 戴维·佩珀. 生态社会主义: 从深生态学到社会主义 [M]. 刘颖, 译.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5.
- [12] 习近平. 习近平谈生态文明 [EB/OL]. (2014-08-29) [2018-11-20]. <http://jhsjk.people.cn/article/25567379>.
- [1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7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8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5] 刘仁胜. 生态马克思主义发展概况 [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06 (3): 58-62.
- [16] ANDRE GORZ. Capitalism, socialism, ecology [M]. London: Verso Books, 1994.
- [17] 福斯特. 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 [M]. 宋兴无, 耿建新,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 [18] PAUL BURIETT. Marx and nature [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9.

## Enlightenment from Ecological Marxism to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China

CHEN Ren-feng, PANG Hu

(School of Marxism,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Eco-Marxism aims to seek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man and nature, which is basic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theme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man and natur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China. The enlightenment of eco-Marxism to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China lies in: firstly, taking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people’s ecological mind as the guiding idea to realize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man and nature; secondly, discussing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man and n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nflicts among people, and then grasp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lastly, emphasizing the decisive role of institution,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of socialism i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Key words:** ecological Marxism;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nlightenment

(责任编辑 陈蒙腰)